

历史的选择

1921—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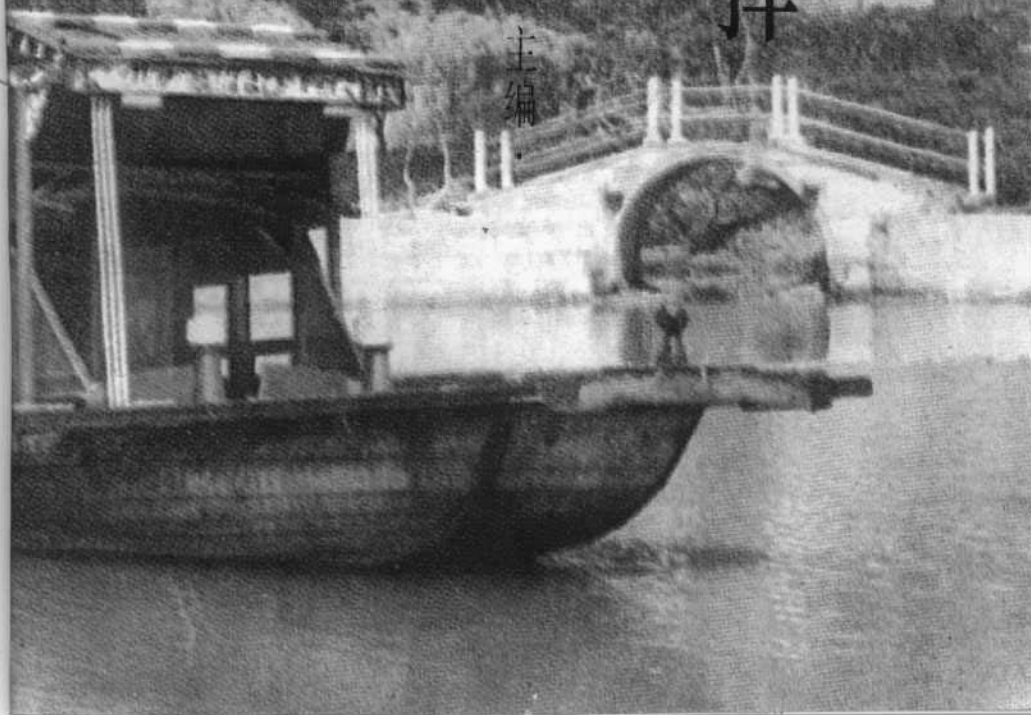


张静如·主编



历史的选择

张静如、主编



历史的选择

1921—1991

主编 张静如

编著 张静如 姜华宣 吴家林

宋桂芝 周 鸿 陈明显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72千字 插页2

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80053-904-0/D·176

定价：4.25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应运而生	(11)
一 时代曙光	(11)
二 党的诞生	(17)
三 新的阶段	(22)
第二章 首战失利	(31)
一 国共合作	(31)
二 国民革命	(39)
三 中途夭折	(45)
第三章 探索道路	(51)
一 黑暗统治	(51)
二 开辟新路	(56)
三 民族危机	(64)
第四章 抗敌御侮	(72)
一 全民抗战	(72)
二 反对分裂	(81)
三 抗战胜利	(90)
第五章 夺取政权	(96)
一 争取和平	(96)
二 解放战争	(102)
三 卓著功勋	(112)
第六章 必由之路	(117)

一 艰辛起步	(117)
二 历史必然	(126)
三 光辉成就	(138)
第七章 曲折前进	(147)
一 全面建设	(147)
二 艰难前进	(158)
三 对错交叉	(161)
第八章 十年浩劫	(166)
一 良好愿望	(166)
二 事与愿违	(169)
三 幸运结局	(176)
第九章 新的飞跃	(180)
一 伟大转折	(180)
二 强国之路	(194)
三 立国之本	(208)
结语	(216)
后记	(222)

导 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这一结论，形成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对历史性的命题，必须进行历史的论证。本书的任务，就是要透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说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被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所选择。为了便于论证和说明，我们先把视野扩展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通过历史思考一下，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怎样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的。

在古代、中世纪，中国原本是世界上一个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刻苦耐劳，以自身的巨大力量和智慧，造就出灿烂的文明，诸如著称于世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名扬四海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享誉中外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赵州大石桥等宏伟建筑工程，以及长期保持领先地位的天文、冶炼、造船、医药等学科，使中华民族直到18世纪中叶仍走在世界的前头。

但是，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虽在其末期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并未能导致社会的根本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西方世界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社会变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华民族逐渐被挤出世界先进行列，中国便成为落后的国家。

侵略和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本性，落后且资源丰富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掠夺的目标。1840年，作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随后，其他资本

主义国家相继入侵。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概括最科学。他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自然经济，给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于是，在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离了萌芽状态而开始得到发展。中国人经营的近代工业，最早的是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的军械所是最初的尝试。到1890年，军火工厂已有19个。这类工厂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如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到1879年，雇佣工人达2000多名。这些军工企业的经费由清政府供给，产品交军队使用，不是商品生产。所以，这些工厂并非资本主义性质的。随着军事工业的出现，提出对于原料和燃料的要求，加之受外货倾销和外资企业利润优厚的刺激，70年代开始，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不同形式，创办了一批采矿、冶炼、纺织和交通运输等企业。到1894年，这类企业共有29个，雇工2万余人。由于这类企业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产品，销售于市场而获取利润，所以它们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又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官办工业的封建性和处处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买办性。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出现。最早的是机器缫丝业。1872年，广东商人陈启沅在南海创办昌隆缫丝厂。10年后，这类工厂在广州附近发展到11家。在上海，从1882年以后，也陆续建立了几家缫丝厂。比缫丝业晚几年，出现了棉纺织业，随后又陆续创办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企业。在重工业方面，民族资本也开始投资，但经营困难，收效甚微。民族资本

的近代企业，在当时的中国，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着，速度十分缓慢。从1872年起，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1894年前后，一共开办了100多家企业，雇工约3万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相对加快了一些。从1895年至1911年的16年间，设立厂矿490家，资本总额1.1亿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上升的，但却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因为它根本无法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箝制。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并非想把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达到目的的手段，首先是军事上的侵略。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又发生了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外国侵略势力通过战争打败中国之后，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根据这些条约，他们得到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和大量赔款，取得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以及领事裁判权。他们控制了在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他们直接管理的租界。他们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对外贸易和交通事业，为其大量倾销商品提供极其有利的条件。他们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他们在中国经营了许多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一下子把它变成自己独占的殖民地都不可能，于是便形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划分一定势力范围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列强就力图培植中国的反动势力，为其统治中国服务。他们不但利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而且造成一个买办资产阶级，使

这两个阶级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100多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中国始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之中,是一个贫穷、落后,任人欺辱、宰割的国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第一天起,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一个救亡图存的问题。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民族存亡的危险日益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一切爱国的阶级、阶层和人士的忧虑,努力寻找救国的出路。特别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要求日益迫切。这种要求与救亡图存相结合,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于是,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有识者在内的先进人物层出不穷。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提出许多有益思想和救国方案。他们的想法虽各有特色,但都主张要想办法把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学到手。为此,他们做了许多事情,甚至有人流血牺牲,却始终没有弄明白:要使中国由落后、贫穷变为先进、富强,实现社会现代化,仅仅学西方的一些皮毛不行,仅仅搞些改良不行,关键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把政权掌握在人民的手里。

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反映了农民及下层民众摆脱剥削和压迫的要求。他们用真刀真枪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进行战斗,甚至夺取了部分政权,建立起农民的“天国”,与清政府抗衡。但是,他们毕竟是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者,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前景,提不出革命的纲领,摆脱不了自身根本弱点的束缚,失败是必然的。他们的战斗、流血,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对挽救中华民族危机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给予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阻止了殖民地化的进程。

比较能认清实现资产阶级政治要求和救亡图存出路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他的思路很清楚，要使中国独立、富强，第一步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说孙中山比较能认清，就是说他还不能完全认清。孙中山最不清楚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认不清帝国主义本质，一个是想实现避免资本主义弊病的资产阶级共和制以救中国。后者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幻想，既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消除其固有弊病，而不能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无论什么设想，都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孙中山的诸多认识不清，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然而孙中山毕竟对近代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孙中山从投入革命斗争时起，就积极建立革命组织，聚集革命力量，发动旨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小团体。在这个组织的会员入会誓词中规定奋斗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一面在华侨中募捐，购运枪械，一面组织部分会员进行军事训练。1895年2月，孙中山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清军。先后有不少会党首领和清军官兵加入兴中会，国外的会员也纷纷回国，准备起义。但起义届临，却因谋事不密，枪械在海关被扣。同时，又有人告密，广东官方大肆搜捕。兴中会会员和参加起义的群众70多人被捕，孙中山等逃离广州，避居国外。广州起义虽未经发动即失败，却有着重要意义。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开端。此后，孙中山在国外从事理论研究。1900年10月，孙中山又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发展到2万余人，给清军以很大打击。但因起义缺乏群众基础，军械和给养不足而失败。孙中山的多次斗争，特别是他那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不但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孙中山成

为众望所归的革命派领袖。就是在一般民众中也有相当多的人知道孙中山的为人及其从事的斗争的正义性。于是，人们自然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身上，给予他们极大的信任。

为促进革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一方面利用报刊书籍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一方面积极筹备建立政党。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革命志士云集的日本，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部分成员商谈建立统一革命组织问题。30日，70余人聚会，决定成立同盟会，并以孙中山在1903年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由于人心所向，入会人很多，不久即有100多人。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主持执行部。同盟会不同于以往带有浓厚地域色彩、基本上没有摆脱旧式会党组织和活动方式的革命小团体，既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组织形式，又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已经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和司令部。

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之后，他又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重要讲演中，把三民主义的内含作了具体的解释。他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这一解释，使孙中山从单纯的“种族革命”观点，向前进了一步，把少数满族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群众区别开来，明确了革命的对象。他又指出：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是恶劣政治根本，必须实行政治革命，“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实际上指明了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孙中山想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弊病，他提出的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

民所共享。”三民主义纲领，虽然不可避免存在着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一部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列宁高度评价过这部纲领，指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①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富裕的愿望。作为革命的旗帜，三民主义在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的论战中进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逃亡到国外，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国内君主立宪派与其呼应，形成一股反对孙中山革命的逆流。为此，孙中山及革命派的一些领导人，与其进行了论战。在论战中，革命派坚持必须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批判了保皇派反对革命的谬论；革命派必须坚持夺取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批判了保皇派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革命派坚持要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土地国有，达到平均地权的目的，驳斥了保皇派对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指责。这次大论战是近代中国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开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作了思想准备，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1906年至1908年，同盟会曾多次领导了武装起义，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边境地区。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夺取两广，然后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响应，进而推翻清政府。但这些起义都未成功，原因是革命党人缺乏依靠群众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决心。

到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又举行了广州起义，经过激烈战斗，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事后，广州革命志士收集烈士遗体72具，合葬于黄花岗。这次起义虽然损失惨重，但革命党人舍身救国、视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如归的英雄气概，却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决心，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0月9日，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发动了武昌起义。起义军先占武昌，继占汉阳、汉口，随即成立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的胜利，震撼全国。湖南、陕西两省首先响应，到11月下旬，先后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15个省宣告独立，清政府的统治迅速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及时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共和政府成为时局的关键。经过各方势力的妥协，决定设临时政府于南京。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回到上海。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他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把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所有为辛亥革命建树了功绩的人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称颂和怀念。

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也体现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上。为健全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建立临时参议院，规定由每省派遣参议员三人组成。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随后，制定了许多重要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3月11日公布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它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临时政府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和纳税、服兵役等义务。这部约法虽有不少缺点，也不完备，但它反映了革命党人反对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愿望，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此外，临时政府还公布了许多政策法规

和革新措施。在扫除封建弊政方面，规定凡政府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废止历代官厅的“大人”、“老爷”等称呼；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禁止吸食鸦片、赌博、蓄辫、缠足、买卖奴婢，保护妇女权利。在经济方面，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宣布振兴实业的方针，废除苛捐杂税，提倡垦殖，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教育方面，废止小学读经和祭孔，删除教科书中宣扬忠君的内容，增加自然科学、实业、实用知识方面的课程，提倡男女同校，缩短中小学学习年限。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利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但是，好景不长。武昌起义一爆发，革命就遇到来自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势力和革命内部敌人等方面的破坏，革命领导力量同盟会也日益涣散。为了急于结束清朝统治，革命派终于妥协。通过谈判，达成清帝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接替的协议。孙中山解职和临时政府北迁，使革命果实落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之手，辛亥革命归于失败。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的结局，令人深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一条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幼稚和软弱。他们缺乏坚决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正确的革命策略，又没有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的决心，因而无法战胜强大敌人的进攻。推翻封建专制，效法西方实现共和政体，是鸦片战争以来有志救国之土的共同愿望，幻想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一切都会好起来。辛亥革命作了尝试，结局是失败。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出现。

当然，从主观上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客观规律。在这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仍然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同样，广大民众一时间也不会认识到这一客观规律，仍然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的选择定会发生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变化。

既然资产阶级不能完成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那就只能由别的阶级来承担。在当时，只有刚刚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是比资产阶级更先进的阶级。这个代表新的现代化生产力，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是与广大群众联系最紧密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本应该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然民族资产阶级不能独立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个任务就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无产阶级也不得不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当然，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必须通过自己阶级的政党，于是这样一个政党就应运而生了。

第一章 应运而生

一 时代曙光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以后，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人民受着日益加重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困苦，社会发展极其缓慢。

孙中山开始是幻想靠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力量，箝制袁世凯搞专制独裁。不久，事实教育了他，使其逐渐认识到袁世凯的本质。他重新打起革命的旗帜，进行护国护法斗争，但屡战屡败。孙中山找不到救国的出路，处于迷惘、徘徊之中。

与孙中山继续奋斗的同时，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怀疑和思索中觉醒、成长起来。他们的思路与孙中山不同，认为辛亥革命后出现极少数人把持政权的专制局面，是因为大多数人受封建主义的桎梏而不觉悟，没有自觉的民主要求。为此，他们发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冲击封建主义旧思想、旧传统，改造国民性。这场运动开始于1915年，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问世为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所倡导的“民主”是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为它服务的旧礼教、旧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人权和个性解放；他们所倡导的“科学”，是反对封建盲从、宣传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科学，鼓励积极的进取精神，要求用理性和科学态度判断一切。同时，新文化运动还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新

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继续，它对封建主义的冲击和对民主主义的宣传在规模上、深度上都远远超过辛亥革命以前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极大地震动了人们的思想，唤起了人们的民主主义的觉醒，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启蒙固然重要，救亡尤为迫切。现实使人们在思想解放之后，更关心中国的出路问题。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除了主张向西方学习外，就无所作为了，这当然无法满足人们改变中国现状的要求。

正当中国先进的人们为寻找救国真理而困惑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个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曙光和新的希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描述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李大钊。他在十月革命后，认真弄清楚这次革命的真相，特别是了解到指导这个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既然俄国人民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解放，为什么中国人民不可以靠马克思主义指导得到新生呢？正是这种思考，使李大钊毅然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明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不同性质，指出“立于社会主义上”的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随后，他又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指出，由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新潮